

生存与命运 (上)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苏联]瓦·格罗斯曼 著 严永兴 郑海凌 译



ЖИЗНЬ
И СУДЬБА

译林出版社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当代系列

I512.45

80

ЖИЗНЬ И СУДЬБА 生存与命运 (上)

[苏联]瓦·格罗斯曼 著

严永兴 郑海凌 译



译林出版社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当代系列

I512.45

80:1

ЖИЗНЬ И СУДЬБА 生存与命运 (下)

[苏联]瓦·格罗斯曼 著

严永兴 郑海凌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存与命运 / (苏联) 格罗斯曼 (Гроссман, В.) 著; 严永兴, 郑海凌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2

(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ISBN 7-80657-007-1

I. 生… II. ①格… ②严… ③郑… III. 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8154 号

Copyright © 1988 by В. Гроссман.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Copyright Agency of China.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 书 名 生存与命运
作 者 [苏联]瓦·格罗斯曼
译 者 严永兴 郑海凌
责任编辑 陈肇芬
原文出版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Октябрь, 1988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W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1.75
插 页 8
字 数 795 千
版 次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007-1/I·008
定 价 (上下两卷)43.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序 言)

严永兴

—

今天,当新的一个世纪来临之际,面对二十世纪,人们不禁赞叹:那是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世纪。但是,不能忘记,二十世纪亦是灾魔施虐、战争频仍的世纪。

半个多世纪前的一场惨绝人寰的法西斯战争,以史无前例的规模,令全世界生灵涂炭,社稷丘墟。但经受巨大创伤和痛苦的世界各国人民,不屈不挠,奋起抗击,经历上千个日日夜夜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史学家们为我们记录下了这一功彪青史、名垂千古的不朽业绩;文学家们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个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动人故事。

一如十九世纪拿破仑的一场侵俄战争,使大文豪托尔斯泰日后创作出不朽名著《战争与和平》,二十世纪的一场卫国战争,亦使托尔斯泰的后人们在反法西斯战争这片混和着爱与恨、血与泪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战争题材作品,引起千万读者心灵上的强烈震颤和共鸣,亦造就了苏联战争文学的辉煌。

二战后苏联战争文学的辉煌,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这场长达1481天,牺牲2700万人的战争,给苏联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和心灵创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痛,英勇战斗为国捐躯的业绩,同仇敌忾战胜法西斯的胜利喜悦,苏联每个家庭都曾经历过,都给

他们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原野犹应厌膏血，风云长遣动心魂”，一部优秀之作就足以打动他们的心扉，引起强烈的反响。

对作家们来说，四年的战争，残酷血腥而富悲壮正义，征战乱离更添酣歌芳菲，为他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战争能把人投入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去经受生与死、灵与肉的严酷考验。战争中不但有统帅、英雄、勇士，亦会有暴君、昏官、懦夫、逃兵和叛徒。战争中既有平凡枯燥的日常生活，也有最广阔的舞台，最雄壮的场面和最富智慧的军事谋略、外交斗争、谍海风云。因此，作家若能恰当把握战争中的各种细节、事件和人物，若能将战争与和平、人性与兽性、宽容与暴戾、爱与恨、生与死、善与恶等诸如此类的永恒主题演绎得像模像样，便可能笔端惊风雷，写出激动人心的作品，催人泪下，发人深省。

不过，苏联作家中，除了庸才和天才，还有一种不安分者，他们除了追求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和风格，寻求新的艺术视点，探索与内容相适应的艺术表现手段外，非要去挖掘人在战争中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力量，去探索战争现象本身所包含的道德内涵和人道主义力量。说白了，就是去做本该由文艺学家、哲学家、军事家、战争史家们来做的事情：探索人面对死亡和屠杀时的复杂心理，探讨战争初期苏军一溃千里的社会历史原因，追究谁该承担战争失利的责任，以及非英雄化、极权主义、社会主义的未来道路等等严肃而敏感的政治问题。

但是，他们似乎忘了，在苏联，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代，文艺作品固然离不开政治，有时却是必须退避三舍的。否则，突然不知哪句话讲错了，什么地方有违政策，立刻会被一群批评家、甚或管意识形态的头头按倒在地，打个皮开肉绽。显然，战争题材作品在官方眼里，不单是部艺术作品，更是弘扬军事爱国主义、以英雄人物教育下一代、防止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武器。因此，表面上看，战争文学像是一艘豪华巨轮，可掌舵的并非俄罗斯文人。它不

能自由自在游弋在辽阔的文学海洋，却被迫驶入一条狭窄的航道。它亦像是棵碧绿葱茏的参天大树，不过常常会有园丁们来给它修枝，东剪西剪，修得那些不安分者没了脾气，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行荆棘。但亦有“修”成正果者，他们不追慕虚名浮利，对时髦不趋之若鹜，不看别人的脸色，甚至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以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文化意识来写作，用思辨剖析战争，以理性面对政治，将文学看做人学，终于成就超凡脱俗的战争名篇，寻求到生命、人道、人性的真谛。格罗斯曼的巨著《生存与命运》便是其中之佼佼者。

二

瓦西利·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在中国几乎是个陌生的名字，他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只小四岁，但名气却比奥氏小多了。不过论才气和作品的艺术、思想深度，格罗斯曼则不知要高出几许。

格罗斯曼一九〇五年生于受犹太文化影响极深的乌克兰的别尔季切夫，母亲为犹太人。一九二九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毕业后来到著名的顿巴斯矿区任工程师。一九三二年他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格柳卡乌夫》寄给高尔基，征求大师意见。很快便收到高尔基的回信，高尔基指出，他必须克服描写顿巴斯矿工日常生活和工作上的自然主义，删除多余的话，更合理地组织素材。格罗斯曼似乎茅塞顿开，花费一年工夫进行修改，一九三四年这部中篇小说在《文学顿巴斯》上发表。同年，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在别尔季切夫城》在《文学报》上发表，高尔基读到后，邀他见面。格罗斯曼回忆道，这次会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今后的生活道路。

无独有偶，瘫痪在床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亦于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发表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两人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同

时起步，一个经高尔基点拨，一个由编辑加工润色，但格罗斯曼刚刚起步，奥氏已经在飞跃了。

格罗斯曼急起直追，一连发表了几部短篇小说集《幸福》（一九三五）、《四天》（一九三六）、《短篇集》（一九三七）和中篇《厨娘》（一九三七），可依然是名文坛小卒。四卷集长篇小说《斯捷潘·科尔丘金》（一九三七—一九四〇）才使他一举成名，跻身文坛。作品描写青年工人斯捷潘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过程。但这种题材和手法一般的作品，当时在苏联多如牛毛，算不得上品。

卫国战争期间，格罗斯曼作为《红星报》军事记者一直活跃于前线，写作了《主突方向》、《特雷布林的地狱》等名篇。中篇《人民是不朽的》一九四二年发表在《红星报》上，成为苏联战争文学的经典作品。从卫国战争期间到战后初期，苏联作家创作了大量作品，讴歌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精神。这些作品无疑给在战争中殊死搏斗、保卫祖国和战后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的苏联军民，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包括《人民是不朽的》在内，这一时期战争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对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英雄主义的张扬，充满万众一心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坚定信念和阳刚之气。这既体现了面对灭绝人性的凶恶敌人和国破家亡的严峻局面，文学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政治、军事、社会复杂背景下文艺政策所使然。谁也不会在这种时候去写什么离经叛道的作品，只有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毛头小伙，才会不知深浅从前线给友人写信，暗骂斯大林，使自己受那缱绻之苦。

一九四三年，格罗斯曼开始构思并创作描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长篇三部曲，第一部《为了正义的事业》于一九五二年在《新世界》第四期上发表，历时九年。这时世事发生了许多变化，战争文学亦不例外。如果说，四十至五十年代的战争文学，单凭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便能满足浴血奋战、获得解放并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大众感情自喷和时代需要的话，那么此时的读者开始了对战争

的反思,他们要求了解战争的真实,人民所受苦难的真实,人们心灵所受创伤的真实。亦就是说,要求作家讲真话,写真实。因为惟有在真实平凡的事物当中,才能发现深邃的哲理。因为他们活着过来了,不是由于有太多的欢乐,而是因为有许多苦难,这些苦难在他们的挣扎下,都过去了,且从记忆中升华,成为面对未来的泰然和期盼。

九年磨一剑的格罗斯曼,敏锐地感受到了读者的这种心态和需要,在《为了正义的事业》中,展示了惊心动魄的斯大林格勒车站防御战,一个营的战士血战到最后一人,无人动摇、退却和生还。作品还描写希特勒空军对斯大林格勒疯狂的八月轰炸和保卫城市的红军战士、工人民兵、全体居民的坚韧不拔和悲惨命运。作品一经发表,立刻受到好评和赞赏。同年七月乌克兰诗人巴让去信,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创作了这样一部富有人性的、深邃的、不说恭维话的作品。一九五三年初,一位列宁格勒读者给他写信说,最近十年没有一部作品能像《为了正义的事业》那样深深打动她的心。但对他的批判亦接踵而至,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三日,评论家布宾诺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小说“除了几个章节外,完全是失败的”,“苏维埃人的形象在长篇中是苍白的、顺从的、没有特色的”、“作者力图证明,是平凡的人们建树了不朽的功勋”,“缺乏对这次胜利的组织者党的评价”。

同年三月,斯大林逝世后的第十九天,苏作协理事会举行会议,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在题为《作家协会工作的某些问题》的报告中,严厉批评格罗斯曼的《为了正义的事业》宣扬“善恶循环的反动唯心主义哲学”和“无冲突论”。一九五四年,作品出书时,格罗斯曼不得不作了大量修改。但依旧难逃厄运。一九五六年以后,他的作品不准出版和再版,一个并非十分响当当的作家,从此淡出江湖,要不是政治上的机遇,也许,他真的便会永远销声匿迹,在文坛上消失。

三

苏联的文化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传扬一些人的声誉，哪怕他的作品虚假苍白得令人咋舌；另一方面它把一些作家视为异类，打入另册，贬损他，批判他。摇旗呐喊式的传扬和狂风暴雨般的贬损，都源于一个时期的文艺政策和某些人卑劣狡黠、颂上媚俗的心态，与正常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而北辙。遭此劫难的岂止格罗斯曼一人，而且他既不愿意从此搁笔、停止创作，又不愿改弦更张、随波逐流，等待他的就只能是更悲惨的结局。

四年的残酷战争，母亲及亲属战争中的悲惨命运，战后辛勤笔耕却遭贬损封杀，对一个文化人来说，是最痛苦的了，格罗斯曼陷入精神上深深的孤独无靠之中。但亦正是这难言的孤寂，使他彻底洗涤人生的喧闹与浮名，去与长眠地下的亲人和战友对话，探寻真理，探寻历史、战争、生存和命运中深层次的蕴藉。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对个人迷信的揭露，使苏联开始“解冻”气候，亦使格罗斯曼那颗冰冷孤寂的心充满希望和新的活力，并产生再次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他重新形成的历史哲学观点的决心。因此，他着手创作的《生存与命运》，虽然是两部曲的第二部，虽然作品的情节线索依然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主线，虽然《为了正义的事业》的主人公除了为国捐躯者，不少人物仍在小说世界中继续生活和战斗，受着生存与命运的煎熬和拨弄，但作品无论从构思、观念、手法到整体的思想艺术水平，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完成了一次飞跃，达到了新的高度。如果说，作家在《为了正义的事业中》所要表达的最高思想，是为正义而战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那么在《生存与命运》中一切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深邃得多。作家已经不是单纯地描写历史事件，描写各种各样主人公的生活和命运，而是用自己的思想之光，用自己对社会、战争、民族、人类命运的独特

见解之光，贯穿于对现实生活和人的生存与命运的根本现象的叙述之中。

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一年，格罗斯曼在孤独苦寂中，又花费八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七十余万字的巨著。四周万籁俱寂，身边除了厚厚一堆倾注了他全部才华和心血的文稿，连个朋友也没有。他轻轻吁了口气，苦涩地摇了摇头，闭上了疲惫的双眸。他不知道，明天到编辑部，他的《生存与命运》将会是个什么样的命运，他更没有想到，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部日后将被誉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经典之作，他从真正意义上完成了一次伤痕累累的文化突围。

第二天，他惴惴不安地来到《旗》杂志编辑部，把沉甸甸的手稿交给接待他的编辑，接着便是战战兢兢的等待。但他何曾料到，即使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即使是在许多“出格”作品纷纷破土而出的“解冻”气候条件下，编辑部的编辑、主编们，读了他的《生存与命运》，还是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唯恐受到牵连和指控，急忙将全部手稿交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令苏联人谈虎色变的克格勃。格罗斯曼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克格勃官员的搜查，所有与书稿有关的东西，甚至包括打字纸和打字色带均被收缴，他的书也再次被禁。

格罗斯曼又一次惊呆了，他的心再次颤栗不已，平日里才华横溢、文辞滔滔的大作家，面对陌生而权重的政府系统，变得笨拙而毫无防护能力，无法调动他的言辞，作像样的辩驳。直至后来我们才得知，格罗斯曼一病不起，他在病中给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哆哆嗦嗦写了一封信，试图拿点儿正当理由顶顶嘴：

为何要对我这部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能满足苏维埃人精神需求的书，要对我这部没有谎言和诬蔑，只有真理、痛苦和对人们的爱之书加以禁止？为何要对我这部书稿

采取行政暴力手段加以没收，并将它当做一个杀人犯那样子以关押？……倘若我这部书满纸谎言，那就让想读到它的人们，让我三十年来为之创作的苏联读者来作出评判吧，让他们来说说在我的书中，有的是真理还是谎言吧。但是，读者被剥夺了用世界上最严正的法庭（我指的是心灵的法庭，良心的法庭）来评判我和我的著作的可能性。过去和现在我都希望有这样一种法庭。

（苏《文学问题》一九八八年第十期，第二十八页）

上诉状似泥牛入海，格罗斯曼本应该想到的，但是他在《生存与命运》上实在浸淫了太多的心血，他对赫鲁晓夫实在抱有太大的希望。面壁八年，他在淡泊和灭寂中使自己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升华，亦使自己有了一份不理睬别人颐指气使的勇气和从容，他甚至敢于在自己的书中指出，苏联人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抗击法西斯，并非为了斯大林，而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民族，为了战后能有更大的自由、更美好的生活。既然如此，那他还怕什么？在苏联，在俄罗斯，有许多文人绝不怕为真理、为百姓而捐躯，但他们却怕出不了书。格罗斯曼未遭逮捕，他也不怕逮捕，却在诚惶诚恐、揪心地等待赫鲁晓夫的批复中度日如年。一九六四年，他因癌症在莫斯科溘然长逝，留下了遭禁的作品和永久的遗憾。

亦有消息说，格罗斯曼生前已经得知他作品的命运。据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八十年代的回忆录透露，赫鲁晓夫当时要么没有阅过格罗斯曼的来信，要么没有弄清它的实质，总之，没有给格氏回信。但他透露，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曾接见过格罗斯曼，并声称：“别再想那部长篇小说，二百年后也许可能出版它。”

另据苏《文学报》一九八八年七月六日报道，著名作家巴克拉

诺夫在第十九届全苏党代会上的发言透露,苏斯洛夫曾表示,《生存与命运》“这部长篇小说二百年后也不可能出版”。两人的说法不完全相同,但意思是明确的,即一位掌握生杀大权的重要官员实际上宣判了作品的无期徒刑。不过历史给苏斯洛夫开了个极大的玩笑,《生存与命运》不是二百年,而是不到二十年,便于一九八〇年在瑞士出版了它的俄文本。一九八二年苏斯洛夫本人未能摆脱自然规律,撒手人寰。一九八四年作品被译成德文,一九八六年英文版在美国发行,所到之处,都引起轰动和强烈反响。英文版译者罗伯特·钱德纳在“前言”中称,“这是本世纪真正的《战争与和平》。”沃尔夫·贝克尔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日的《明镜周刊》上撰文说,“作品令人感动”,格罗斯曼“那种无畏的勇敢精神值得钦佩”。罗德纳·欣利在《纽约时报图书评论》(一九八六年三月九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生存与命运》的成功在于作家对“重大主题的高度严肃性和他那令人信服的对历史、道德和政治的思考”。

一九八八年,《生存与命运》漂泊二十余年之后终于回到了它的祖国,同苏联读者见面。作品刚在《十月》杂志第一期上刊出第一部分,就引起轰动和读者的强烈兴趣,人们迫不及待地等待刊登它的下一期杂志。作品共分四期连载,每期印数近三十万册,均不到两天便被抢购一空,买不到杂志者只得用复印机或手抄,真可谓“洛阳纸贵,万流景仰”了。读者纷纷给报刊写信,赞誉这部令人“潸然泪下”又“激动万分”的巨著,称它是这些年来读到的“最为出色的作品”。图拉市一位领退休金的老者给《文学报》去信说:“我记得,当时我怎样读完了格罗斯曼的长篇《为了正义的事业》,怎样等待着它的续篇……幸运的是,我等到了,可令人痛苦的是,为此竟需要三十余年的时间。”(《文学报》一九八八年第九期)

一场政治漩涡使格罗斯曼沉入了海底,戈尔巴乔夫的一场不成功的政治改革又使他浮上水面。这亦应了一句老话:是珍珠终将放出光彩。历史是公正的,真正的艺术是埋没不了的。

四

生前冷落，死备哀荣，对笔耕终身孜孜以求真理和理想的文学家来说，这种截然相反大起大落的矛盾命运在苏联原亦并不罕见。倒是文艺学界和评论界对《生存与命运》的评价之高，令人刮目。不妨引鲍恰罗夫与阿纳尼耶夫的两段评论。鲍恰罗夫一九二二年生，莫斯科大学教授，著述甚丰，有关于苏联文学的研究和评论专著近二十部，一九七三年更因一部《人与战争·战后军事散文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名闻遐迩。此次他为《生存与命运》撰写了几万字的后记，将长篇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他说：

我们的评论家们经常叹息，哪儿有类似《战争与和平》的、描写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战争的史诗作品？《生存与命运》以及它那强有力的历史哲学观点，就是这种规模的作品。

（《十月》一九八八年第一期第一二九页）

阿纳尼耶夫 1925 年生，著名战争题材作家，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十月》杂志主编，他撰文道：

格罗斯曼是我们时代的伟大作家，《生存与命运》是苏联文学的经典之作。

（《文学报》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可见，对格罗斯曼和他的作品《生存与命运》之评价异乎寻常的高。当然，这里所引只是几段结论性的意见，评论家们自有他们

对作品的详细阐述，无须笔者赘述。

当年，初读《生存与命运》，我就曾被作者大胆的思想、犀利的笔触、主人公们催人泪下的悲惨命运和作品史诗般的规模所震撼。作为一位研究苏联文学现状的学者，我曾读过大量新出版的，甚或“回归”的苏联文学作品，确实，没有一部作品能如《生存与命运》那样具有如此强烈的震撼力，具有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史诗规模。激动之余，促使我迫不及待欲将格氏的这部作品译过来，介绍给我国读者。但料想不到，由于某个环节上的疏漏，未能将本人在清样上对译文所作的详细校订予以勘正，以致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十年后，译林出版社购得此书的版权，并慷慨伸出扶掖之手，给了我一个“改正讹误”的机会。

同样，十年来风云际会的国际形势，尤其是苏联的解体和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获益匪浅，明白了许多道理，回过头来，再来重读《生存与命运》，那感受和体会，真所谓“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当年，作品之所以在它的本土苏联引起轰动和巨大反响，首先因为它是一部“禁书”，是一部被苏共领导人苏斯洛夫判处过“死刑”的作品。如今，斯人已逝，峨冠博带已零落成泥，他的名字亦早被忘诸脑后，但广大读者，就是要看看当年被他枪毙的这部书究竟写了些什么，会让他如此暴跳如雷。

这也许就是逆反心理。但是，读完全书他们才发现，原来书中充满强烈的反思意识，格罗斯曼对历史，对历史事件，对战争，对斯大林格勒战役，对千百万人的命运和造成他们悲惨命运的原由进行了深刻反思，大胆而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而这些见解和看法并不是作家在当前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情况下才提出来的。于是乎，作家非同凡响的历史哲学观点，他那正直的作家良心和勇气，他完成作品后的不幸遭遇，都激发起读者对他的崇敬之情和对长篇的“狂热”兴趣。

实际上,光有这两条,还远远不够,它依旧可能如夜空中的焰火,五彩缤纷,轰动一时,随即烟消云散,无法光耀人间,在俄罗斯广袤大地上长存和平文明的火种。只有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样优秀的文艺作品,才能让历史成为一面镜子,才能让道德价值在文化中积淀,才能让人民产生凝聚去争取和平、追求美好的明天。

那么,格罗斯曼如何呢?他能不能将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那场战争,写成类似《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史诗作品?可以说,他做到了。他的长篇小说《生存与命运》是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结构庞大,线索繁多,人物无数,气势恢宏,具有真正的史诗规模,“最接近于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坚持的俄罗斯史诗传统”(鲍恰罗夫语),确实堪称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五

本书的基本情节框架,是震惊世界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一场九十天的保卫战和一百小时的大反攻,悲惨壮烈,艰苦卓绝,使得不可一世的希特勒保卢斯兵团,从疯狂进攻,到被迫防御,最终全军覆没,成为卫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

在这么一场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战争面前,敌我双方,与其说是兵力、武器、装备的较量,不如说是人心、士气、精神的较量。作品充分显示了苏联人民在这场反对法西斯暴力和奴役的生死之战中,表现出的英勇气概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这种气概和精神是胜利的源泉,每位战争题材作家必得大书特书,格罗斯曼自然也不例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是人人都懂得的。但是,在为谁而战的问题上,过去战争小说中常见的那种苏军将士振臂高呼“为斯大林而战”,冲向敌阵的场面,在《生存与命运》中却

荡然无剩。九十天的巷战在斯大林格勒的街垒上杀得天昏地暗。一座孤楼，四面被围，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坚守孤楼的是一支“杂牌军”，有上了年纪的工人民兵，有突出重围的散兵游勇，有刚毕业的军校学生。领队的是个上尉，但大伙儿都叫他“楼长”。这里管理松懈，没有上下级的尊卑，不作战斗动员，不记战斗日志，不向上级汇报，吃的是烂土豆，喝的是锅炉水。他们都曾经历过种种悲惨命运，带着生活的创伤，心里却装着对亲人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默默忍受着死亡的威胁，打退德军一次又一次的突袭，最后在总攻开始时，被疯狂突围的德军坦克和重炮连人带楼一起摧毁。幸免于难的只有一老两少和一个侦察员。“楼长”在总攻前夕，以战时不合时宜地谈情说爱为由，命令一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通过新挖的地道，至团部去接受处分。老民兵想念这对青年，“楼长”同意他去探望并让他跟侦察员一起去，实则让他们走出了死亡。

在托尔斯泰看来，拿破仑就是战争，而俄国士兵则是和平。在格罗斯曼看来，希特勒是战争，千百万普通苏军战士是和平，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战争的反对者和拯救祖国及俄罗斯民族的中流砥柱。而构成他们精神支柱的，不是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战斗条令、行政命令等社会性的行为模式，恰恰是最不显眼最平凡不过的人的感情与品德，是父母兄弟子女间的亲情，是纯真的友谊和爱情，是正义感，是爱国心，是良善，是乐于助人和勇于献身。他还相信，这一切似乎不是任何经济体制、政治理论、社会变革、宗教信仰所能替代。某种程度上，这恰恰与托尔斯泰的思想不谋而合。

从前方到后方，从斯大林格勒到莫斯科，从希特勒的集中营到卢布扬卡监狱，从乌克兰农舍到喀山，凡是有人的地方，格罗斯曼都在演绎一段段动人心扉的故事。斯大林格勒发电厂的老厂长，将一批批工人疏散到后方，自己却日夜守卫着被炸得只剩下一堆断垣残壁、废铜烂铁的厂房，始终在地下室里与女儿为伴。女儿已